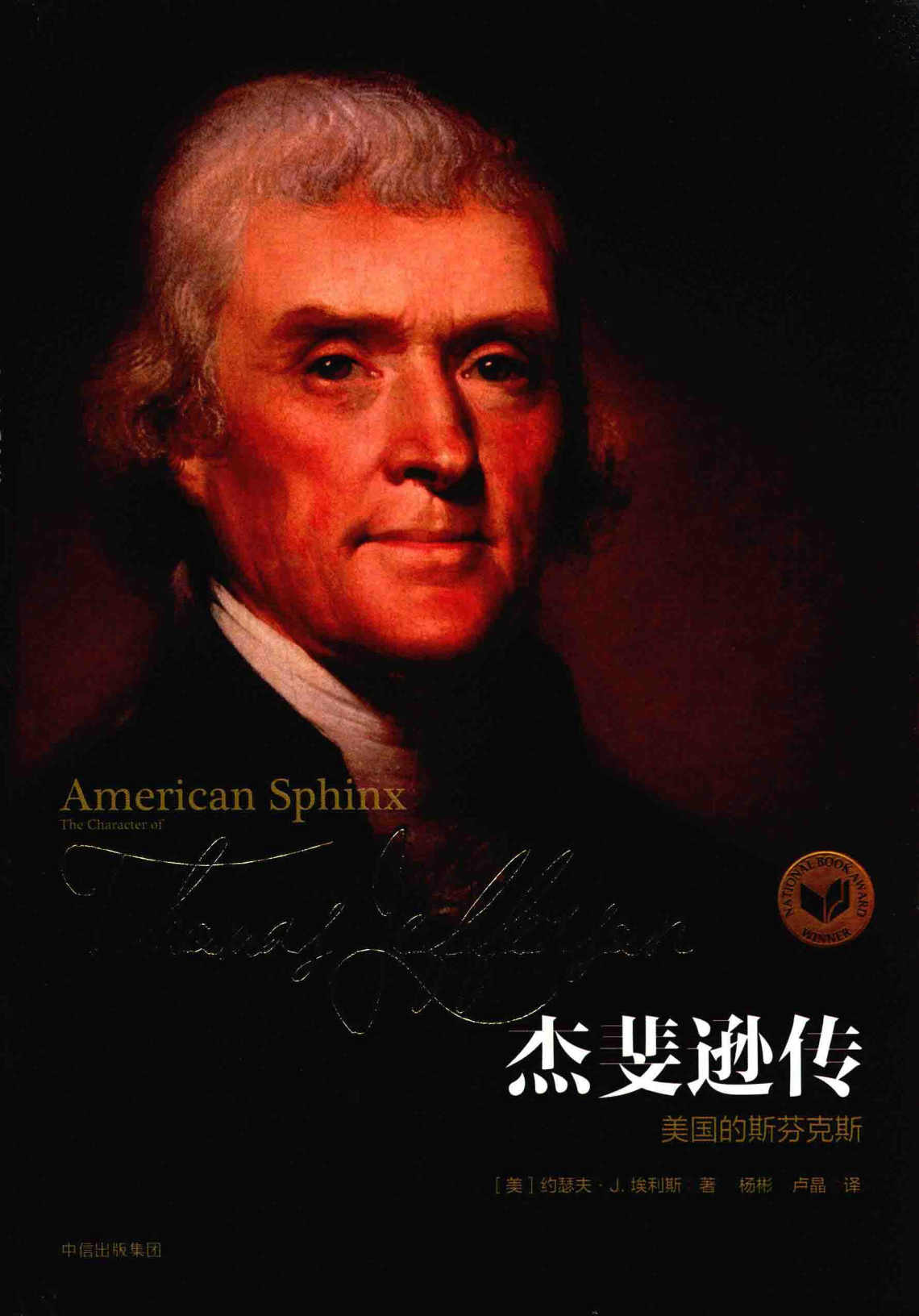




American Sphinx

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



杰斐逊传

美国的斯芬克斯

[美] 约瑟夫·J. 埃利斯 著 杨彬 卢晶 译

中信出版集团

Thomas Jefferson

杰斐逊传

美国的斯芬克斯

「美」约瑟夫·C·埃利斯◎著
杨彬 卢晶◎译

American
Sphinx
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杰斐逊传：美国的斯芬克斯 / (美) 约瑟夫·J. 埃利斯著；杨彬，卢晶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1

书名原文：American Sphinx: 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

ISBN 978-7-5086-8110-8

I. ①杰… II. ①约… ②杨… ③卢… III. ①杰斐逊 (Jefferson, Thomas 1743-1826) — 传记 IV. ①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 213457 号

American Sphinx: The Character of Thomas Jefferson by Joseph J. Ellis

Copyright © 1996 by Joseph J. Elli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New York.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 S. A. through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杰斐逊传：美国的斯芬克斯

著 者：[美] 约瑟夫·J. 埃利斯

译 者：杨彬 卢晶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7-6210

书 号：ISBN 978-7-5086-8110-8

定 价：66.00 元

印 张：14.5 字 数：408千字

印 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纪念埃德蒙·S. 摩根 (Edmund S. Morgan)

前言与致谢

Preface and Acknowledgments

任何一位雄心勃勃的杰斐逊传记作者，意识到关于杰斐逊（Jefferson）的书籍已是频频付梓，图书馆里比比皆是，最好还是要回忆一下那个弗吉尼亚（Virginian）年轻人在 1776 年写下的举世闻名的文字。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应该“由于微不足道和暂时的原因”而另外再写一本关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书。事实上，“为了慎重起见”以及“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出版关于那个来自蒙蒂塞洛（Monticello）的男人的新书，都必须发布正式的宣言来解释非要费心思这样做的原因。

我写这本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 30 年前。那时我刚进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研究生院，研究美国的早期历史。要想掌握美国革命的那段历史，就不可能绕过杰斐逊，因为他的一生跟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都有交集。而且他的思想观点，或者至少是那些让他成为雄辩的时代代言人的思想观点，阐明了新兴的美利坚共和国（American republic）故事的核心主题。此外，和杰斐逊一样，我也是一个地道的弗吉尼亚人，同样也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我甚至像杰斐逊一样，有着红棕色的头发，而且我也学会了用神秘的沉默作为面具来掩盖内心深处的不安。很自然，置身于曾经的新英格兰（New England）清教主义（Puritanism）

和联邦主义（Federalism）的发源地，我能深切体会到当年杰斐逊对严苛的苦行生活和新英格兰的寒冷气候疑虑重重。

我的研究生导师埃德蒙·S. 摩根（Edmund S. Morgan）在他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幅巨大的杰斐逊的画像，是著名的伦勃朗·皮尔（Rembrandt Peale）1800年的作品。画像中的杰斐逊静静地注视着我们的研讨会，透出超自然的权威，让我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心安。我告诉自己，杰斐逊跟我志趣相投，身处这个陌生地方，我们是盟友。在这里，一个人的南方口音似乎与他志趣专笃相关。年轻时代对杰斐逊的这份迷恋最终随着我的南方口音一起减弱了，虽然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接近模糊的边缘，不再清晰可辨了。然而，就像年轻人的爱情，它成了我情感世界里始终挥之不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并不是说我真的非常了解杰斐逊的生活和思想。我对杰斐逊的关注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层面，而非学术层面的考虑。只有一次，在思考论文题目的时候，我想到要研究杰斐逊。我记得，当时是C. 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提醒我要考虑其中的风险。他也是南方人，同样也是刚来到纽黑文（New Haven），但他并非初出茅庐，而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建议道，一个人不要轻易尝试传记，除非他已经经历了世间百态。杰斐逊是一个变幻莫测、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任何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毅然出发去追寻杰斐逊，就像在惨烈悲壮战争故事里，一个机敏的年轻人被派去完成一个毫无胜算的任务。这个忠告听起来的确十分有道理。在接下来的25年里，我没有对杰斐逊做过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

作为一位大学教师，我在课堂上布置了有关杰斐逊的一些书让

学生阅读。我还做过一些学术讲座，讨论《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以及杰斐逊对奴隶制的矛盾立场。但是直到我开始研究一本关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书时，我才真正深入地探究了杰斐逊的一些书信。重新关注杰斐逊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弗吉尼亚人又一次回到家乡，却是取道昆西（Quincy），才到达了蒙蒂塞洛，这显得不可思议，但情况的确如此。

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这段情谊是两人在反对英帝国统治的共同事业中建立的，且两人根植于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不同的地域文化。所以，亚当斯对杰斐逊的情感不单单是钦佩，甚至是喜爱。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50年之久，在晚年时，两人的书信交流成为佳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书信是代表革命一代才智的巅峰之作。但是，亚当斯同时也极度不赞同杰斐逊对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的看法。事实上，他认为杰斐逊所有的政治愿景都建立在一些极具诱惑力的幻想之上。我读的资料越多，越感到亚当斯是对的。平生第一次，我开始用批判和反讽的眼光来审视杰斐逊。

我为《文明》（*Civilization*）杂志创刊号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杰斐逊在当代美国文化中具有争议性的地位，在此过程中，我下定决心，要花时间写一本研究杰斐逊的书。如果对亚当斯的研究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我给《文明》杂志写的那篇文章让我对杰斐逊作为美国偶像的特殊意义产生了新的理解。一个人可以花上几年的时间来研究亚当斯，并且享受这种孤独的状态。但是，研究杰斐逊则如同走进一个拥挤的房间，里面总是充斥着不绝于耳的交谈，而且这持续的嗡嗡嗡嗡的嘈杂声表明，所讨论的更多是生死攸关的紧急大

事，而不仅仅是历史问题的答案。杰斐逊就是个电磁场，极具吸引力。他代表着美国当代文化中最宝贵、最具争议的价值观。他是那些虽已离世却仍为人津津乐道的白人男性中的一员。

这些不断深入的思考不仅仅是我要写一本有关杰斐逊的书的原因，同时也对这本书的内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杰斐逊的大量文献都明显带有夸张的特点，似乎一个人必须在作品开头宣布自己的立场，支持或者反对让-安托万·乌东（Jean-Antoine Houdon）的大理石半身像或者伦勃朗·皮尔的肖像画所塑造的神一般的杰斐逊。这种过分夸大的风格实际上再现了杰斐逊在世时社会舆论两极化和高度政治化的风气。那时候，你要么支持他，要么反对他；要么喜爱他，要么讨厌他。没错，大多数传记作家选择站在所记述的人物一边。但是，就杰斐逊而言，对他的评价界限泾渭分明，需要做出明确的选择，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看上去不可能在崇拜和唾弃之间选择一条较为体面的路径。

但那确实是我在下文中尝试要探索的路径。做这一尝试，是受到约翰·亚当斯例子的启发，相信对杰斐逊的喜爱或批评并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的；这一尝试是源于一种假设，生活在人世间的活生生的人无法承受笼罩在杰斐逊头上的神圣光环。我的内心深处坚信，年轻时候的迷恋一定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对于神圣人物全面而成熟的评价注定会让那些最狂热的崇拜者有几分失望。美国历史的精华和糟粕在杰斐逊这里错综复杂地纠缠到了一起。任何人若局限于这种道德平衡中的一个方面，将注定错失历史故事的重要部分。

我所做的探讨是有选择性的——一位本书的早期读者甚至称之为电影式的呈现——不过还是坚持采用了传统的时间顺序。再写一

部全面记录杰斐逊生平和他那个时代的多卷本的著作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我的目的是捕捉杰斐逊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放大他在这些时刻中的思想和行动，关注在这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展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信念，自始至终为读者所见到的场景提供充足的背景知识，从而可以对杰斐逊的一生有一个大致清晰的认识。这种叙述方法要求所有的选择必须沿着主线进行，即便有所波动。我会同意一些人提出的批评，他们断定杰斐逊担任国务卿的重要时期或者他第二次担任总统时烦闷的经历需要更多的笔墨。我唯一能做的辩解是引用大量已经存在的学术资料，并重申我的观点，杰斐逊的故事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我也承认有自我保护的意愿，即避免许多先前作者的命运：跌入杰斐逊主义的深渊。

毕竟，我们的首要目的是了解杰斐逊的性格、那些充满活力的行为准则，渗透到了他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他成为了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正如我所发现的，他内心当中的信念和忧虑确实存在一个核心。尽管他一直让人难以捉摸，而且又十分擅长掩盖自己的踪迹，但是杰斐逊的价值观仍然有其根本原则，正是这一根本原则决定了他的政治愿景，他将其成功地投射到他自己的世界中，对我们当今的世界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且，我也发现，从1775年第一次登上国家的政治舞台，一直到1826年7月4日逝世，杰斐逊一直忠诚地坚守着他那些核心的信念。可以确信的是，杰斐逊确实有着备受争议的矛盾性格。但他心理上的灵活性、自我安慰和逃避的本领，是他自我保护的工具，以避免他过于激进和极度浪漫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产生激烈的碰撞。正如我要在第一章中说明的，后来的几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发

现杰斐逊主义包含着多层意思，自然就会导致各种不同的解读。但是杰斐逊自己很清楚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他对自己的信念矢志不渝。

我尝试去做的是在 18 世纪晚期的历史背景中，找回杰斐逊以及他所要表达的意义，二者紧密相连。为此目的，书中使用的语言契合了杰斐逊对普通美国人才智的信仰。这意味着学术话语中一些专门性的语言表达已经被转换成了日常、平实的词句。一些术语比如“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辉格党”（Whig）、“自由主义者”（liberal）和“政党”（political party）等有其特殊的意义，没有假定这些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尽管我确实希望我的学者朋友们能阅读这本书，甚至能够发现书中的解读颇有新意，而不可避免的错误少之又少。但是，我真正设想的读者是一大批对托马斯·杰斐逊真正有浓厚兴趣的普通人。

我在学术研究上所欠下的人情债让我联想到杰斐逊最后的日子所面临的财务窘境，我只能用感激之情加以偿还。所有杰斐逊的研究者都会对已故的杜马·马隆（Dumas Malone）和梅里尔·D. 彼得森（Merrill D. Peterson）感激不尽。他们不懈努力，讲述了杰斐逊和他那个时代的故事，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所以跟我的讲述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但是他们为传记作品树立了标杆，为评价其他人的作品提供了参照。已故的朱利安·P. 博伊德（Julian P. Boyd）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托马斯·杰斐逊文集》（*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项目的后任编辑们在整理原始资料方面一直延续了同样的高标准，使得我们讲述的故事有据可

依。最后，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Foundation）的优秀员工们在我数次访问蒙蒂塞洛期间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我要特别感谢基金会主任丹尼尔·P. 乔丹（Daniel P. Jordan）和国际杰斐逊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efferson Studies）主任道格拉斯·威尔逊（Douglas Wilson）。他们不仅安排我去肯伍德（Kenwood）出席一些公开活动，分享自己的工作进展，而且为我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礼遇和支持，即便我并没有得到上帝的眷顾，可以像他们一样深刻了解杰斐逊。

感谢霍华德·亚当斯（Howard Adams）、乔安·弗里曼（Joann Freeman）、安·卢卡斯（Ann Lucas）、波林·迈尔（Pauline Maier）、露西亚·斯坦顿（Lucia Stanton）和玛丽·乔·索尔特（Mary Jo Salter），他们审阅过单个章节的初稿或者一些长篇段落的手稿。感谢凯瑟琳·阿尔果（Catherine Allgor）、安德鲁·伯斯坦（Andrew Burstein）、埃里克·麦特里克（Eric McKittrick）、皮特·欧努夫（Peter Onuf）、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和道格拉斯·威尔森（Douglas Wilson），本书大部分或者说几乎整本书的初稿都从他们的批评中获益良多。按照惯例，需在此说明，上述提到的这些同事，没有人应该为我解读中存在的偏见负责。对托马斯·杰斐逊进行客观的评价一直是个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我获得的意见和建议准确地反映了有关他的精神遗产的巨大分歧。

特别要感谢《文明》杂志的编辑史蒂芬·史密斯，他曾在该杂志上发表了我早期的一些观点和研究内容。本书的“序幕”部分最早在《文明》杂志 1994 年 11—12 月那一期上发表过；我对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探讨发表在 1995 年 6—7 月那一期；1996 年

11—12月那一期上发表了对我对杰斐逊和奴隶制的阐释。

我的经纪人格里·麦考利（Gerry McCauley）时常给我安慰，邀我共进午餐。科诺普夫（Knopf）出版社的编辑阿斯贝尔·格林（Ashbel Green）和他的助手珍妮弗·伯恩斯坦（Jennifer Bernstein）在本书的写作及出版过程中对我一直彬彬有礼，体贴宽容。

整篇书稿都是手写而成，海伦·坎尼（Helen Canney）将手稿转录到电脑磁盘上。她辨认我潦草笔迹的能力已炉火纯青。我的三个孩子——彼得（Peter）、斯科特（Scott）和亚历山大（Alexander），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坠入杰斐逊主义深渊的笑话。我的妻子埃伦（Ellen）是我每一章草稿完成后的第一位读者，总能够提出一些文体方面的修改建议，那都是不可忽略的好建议。

本书开头的献词是为感谢那位历史学家，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修养都彰显着我写作中想要极力模仿、努力表达的崇高意义。

本书于1998年4月由文迪奇（Vintage）出版社出版，在科诺普夫出版社出版精装本时我悄悄地做了一些修订。这些都是细心的读者发现的小错误，虽然作者和编辑们已竭尽全力去避免这种尴尬了。

但是现在，文迪奇的版本需要做进一步的修订，因为尤金·福斯特（Eugene Foster）博士发表了一项DNA的研究成果，明显改变了长期以来关于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关系的争论。一般来说，新证据很少能够对一个由来已久、被反复研究的历史争议问题产生太多影响。但是福斯特的研究做到了。

这个新的证据引发的重大修改是无法做到悄无声息的。我做了

四处重要的修改：第一处，在讨论杰斐逊对当代的影响时加上了福斯特的研究成果（序幕，第36—39页）；第二处，修改了对1802年该丑闻第一次曝光时的描述（第四章，第288—293页）；第三处，在描述杰斐逊生命最后时刻的部分加上了一段话，论述杰斐逊与海明斯的关系（第五章，第384页）；第四处，在记述这一有争论的历史发展过程时插入了对福斯特研究成果的讨论（附录，第406—407页）。

对于海明斯问题，我改变了观点；但对于杰斐逊，我的看法依旧。在这个修订版中，他比以前更能够称得上是美国的斯芬克斯，性格更加复杂多变且难以捉摸，对自己内心的纠结和矛盾更加泰然处之。

约瑟夫·J. 埃利斯

马萨诸塞州艾姆赫斯特市（Amherst）

1998年11月

目录

前言与致谢 *i*

序 幕 杰斐逊热：美国，1992—1993 001

第一章 费 城：1775—1776 031

第二章 巴 黎：1784—1789 083

第三章 蒙蒂塞洛：1794—1797 151

第四章 华盛顿特区：1801—1804 217

第五章 蒙蒂塞洛：1816—1826 295

尾 声 幻想的未来 377

附 录 关于萨莉·海明斯丑闻 393

注 释 400

序 幕

杰斐逊热：美国，1992—1993

Prologue

Jeffersonian Surge: America, 1992–1993

倘若杰斐逊错了，那美国必错无疑。

倘若美国走对了，则杰斐逊功不可没。

——詹姆斯·帕顿 (James Parton, 1874)